

李浴日的孫中山軍事理論研究

李龍

孫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號日新、逸仙，化名中山樵，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人。他是中國近代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軍事家，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在反對滿清王朝和北洋軍閥的武裝鬥爭實踐中形成了他的軍事理論。“他的戰爭理論，繼承中國固有兵法的精神，吸收世界各國兵學的菁華，並加以自己的獨創而成。又是適應中國現代國家社會的需要而建立的。他憑著他戰爭的道理，運用他革命的戰法，既推翻了滿清，又完成了每一次討賊軍事的勝利。”^①李浴日是民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學家，孫中山軍事理論——“孫文兵學”的首倡者和開拓者。他於1942年7月出版了《中山戰爭論》，同年12月增訂再版，後改名《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在國內出版數次，1952年在臺灣首次增訂出版。加上他在其他軍事著作裏的有關論述，形成比較完整的“孫文兵學”理論。為了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軍事文化，本文擬從如下幾個方面對李浴日的孫中山軍事理論研究進行初步概括和總結。

一、 孫中山的軍事研究和實踐

孫中山軍事思想，是孫中山關於戰爭和軍隊問題的理性認識。它作為一個科學體系，有著極其豐富的內容。它以三民主義戰爭、武裝鬥爭為研究對象，主要包括三民主義戰爭觀、戰爭問題和方法論、戰爭指導思想、建軍指導思想等基本內容。孫中山軍事思想是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中產生和發展的。李浴日在《中山戰爭論》裏，通過概括和總結孫中山學習和指揮軍事過程，探討其“戰爭理論的淵源”，揭示其軍事思想的發展規律。從而確認孫中山是我國近代一位偉大的軍事家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一）孫中山的軍事研究

1、對中華民族優秀軍事文化的系統學習和研究。李浴日認為，孫中山是依靠自學及與有關軍事學家交流中掌握軍事理論的：“國父一生雖沒有機會進過軍事學校，卻常和軍事專家研究軍事，並自修古今中外的兵書，尤以他卓越的天才，和在西醫學校時代科學修養的精湛，更助他成為一個大軍事家的所在。”^②“其對於我國古代各兵家兵法，亦有精湛研究，就中以孫子兵法為最。曾評該書說：‘二千多年前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③根據李浴日的研究，可把它分為以下2個階段。

第一階段，啟蒙時期。(1) 在家鄉。“根據我們的考證：國父研究軍事應溯源於太平天國滅亡後十年，國父十一歲在村塾讀書時，村中有一個太平天國的遺兵，常到塾裏為學童講述洪楊革命的故事，國父聽得，深慕洪秀全之為人，推翻滿清之志，不禁油然而生，遺兵對國父特加愛許……並以洪秀全第二勉國父，國父得此徽號，引為無上榮耀，亦輒以洪秀全第二自居。”⁽⁴⁾這說明洪秀全革命思想對童年的孫中山就起過潛移默化的作用。個別學者可能認為這段考證神化了領袖，其實不然。因為一個人小時的生活環境對他將來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孟母三遷”的故事就是古人強調周邊環境影響對一個人成長的重要性。洪秀全革命思想對孫中山的影響正是如此。(2) 入香港西醫書院研習醫學時。“國父自決心致力革命之後，對於軍事學術即特別留意，一八八七年（丁亥）入香港西醫書院研習醫學，常置巨幅中國地圖于樓壁，對之而籌思攻守之方……又與陳少白、尤少紉，楊鶴齡三人昕夕往還，亦常研究軍事問題。”⁽⁵⁾說明此時的孫中山，革命思想開始萌芽。李浴日稱“此為兵要地理研究的開始”。

第二階段，軍事鬥爭思想形成時期。1894年上書李鴻章失敗，孫中山認識到改良主義在中國已經行不通。於是，他借“游東北、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李浴日認為，“此為政治軍事的實際考察。”⁽⁶⁾不久，他到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明確制定反清革命綱領。這標誌著他的軍事鬥爭思想的形成。

為了從事長期的反清革命鬥爭，他鑽研軍事學問，研究戰略、戰術、戰史。“國父對普通軍事書籍，如典範令及各種教程，莫不熟讀。”在《軍人精神教育》裏也提及遊勇戰術的伏擊技能“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卻相暗合。”⁽⁷⁾據馮自由給李浴日的信回憶：“總理生平最爛熟者為太平軍戰史，對於進兵攻城得地之戰法及地理往往如數家珍。其材料除得自私人紀錄及官書外，外人所著關於太平朝事蹟，幾應有盡有。嘗言革命用兵與國家用兵之戰略不同，太平戰法大可採用，並批判其勝敗之由。”⁽⁸⁾說明孫中山對戰學基礎知識以及戰理、戰法已經爛熟，尤精研太平戰法。他全面學習、鑽研軍事的目的，是為他的暴力革命提供借鑒。

2、對西方優秀軍事文化的系統學習和研究。1903年夏，孫中山東渡日本，結識了日本著名軍事專家日野熊藏少佐，與他研究散兵戰術，認為該戰術最適用於揭竿起義的中國革命軍。除了筆記其口述外，孫中山還購置英文的英波戰史及圖書百數十卷，“日夕觀摩，孜孜不倦”，同時為實施同志以軍事訓練。又秘密組織“革命軍事學校”于東京，延聘日野為校長、小室健次郎大尉為助教。學科除普通兵學及製造盆子炮炸藥外，尤注重波亞人散兵戰術的傳授。“至於國父當時為推翻滿清，在粵桂邊境及各地所組織的革命軍或稱“民軍”類似今日的遊擊隊，戰鬥所用的戰術，即是散兵戰術（亦稱“波亞戰術”）。往後國父于民元發表《錢幣革命通電》曾暗示採

用散兵戰術以抵抗帝俄。迄民十一年于《〈軍人精神教育〉的講詞》中又主張採用遊勇戰術（即散兵戰術），以與北方軍閥交戰，可見國父對散兵戰術的心得，及起義軍事所受散兵戰術的影響。”此外還結識了美國“天下最傑出軍事家”堪馬利將軍、俄國嘉倫、李糜及英、德、法將校多人。

“總理所讀各國兵書，以德著英譯為多。據言，軍事學以德著為第一。”⁽⁹⁾據李仙根口述，“總理對外人用兵者最崇拜拿破崙，書架上滿置各國名人關於拿翁之著作……總理對拿翁每次戰役，皆瞭若指掌，有條不紊，據言：諸役以攻奧一役為最神妙，于戰史上最有價值。”⁽¹⁰⁾認為“拿破崙的作戰，深得孫子的蘊奧。”他對於英美各國出版之海軍名著，無所不讀。據說：每年都訂有英國海軍年鑒，常置案上，以供參考，並屢對同志詳論海軍在國防上的重要性。從李浴日的總結可以看出，孫中山的軍事思想、戰略戰術，部分來源、吸收於西方資產階級軍事學思想，特別是法、德軍事學思想。

（二）孫中山的軍事鬥爭實踐

李浴日在《國父指揮軍事的經過》裏，對孫中山堅持武裝鬥爭 40 年做了初步的總結。現以辛亥革命為分界線，把它分前後兩個不同時期。

1、辛亥革命前，主要組織由聯合會黨為主轉為爭取新軍為重點的發動反對清政府的武裝鬥爭。李浴日認為，1885 年中法戰爭結束後，孫中山即決意致力於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以醫術為入世之媒。”1895 年 11 月廣州之役，首開他指揮軍事的記錄：

“欲襲取廣州以為根據，遂開幹亨行于香港為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為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為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通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澹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周，聲勢頗眾。”⁽¹¹⁾後因消息洩露而失敗。但這卻是孫中山武裝革命的重要開端。這一時期所採取的軍事策略、方針，體現了他在暴力革命初期的軍事思想。此後，孫中山積極策劃各地的軍事暴動。由他直接發動起義的有：1900 年惠州之役、1907 年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以及 1908 年欽上思之役、雲南河口之役等。

鎮南關之役是孫中山親自發動對清政府的第 6 次打擊，也是他指揮軍事的典型戰役。這次戰役由於敵我雙方力量懸殊而失敗，但與前 5 次戰役結合起來，積小勝成大勝，李浴日認為，“政治上卻取得巨大成功”，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它動搖了清政府統治，造成革命的聲勢，促進全國各地的起義。1910 年廣州新軍之役及次年 3 月 29 日的黃花崗之役，就是在它們的影響之下發生的，因而也促成了武昌起義。

從李浴日對辛亥革命前孫中山發動的各次武裝起義的總結看，這些起義，均是分散的、小規模的起義，起義人員是以會黨為主，聯絡新軍響應。矛頭直指滿清政府，“民族問題佔有突出的地位”。其暴力革命的策略是遊勇戰術、以少勝多戰術等。

2、辛亥革命後，主要發動了反對封建遺孽及反革命勢力的保衛民國的鬥爭。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成功後，孫中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就職後，他主張用武力徹底解決清帝遺留問題，並進行北伐，統一中國。在《覆黎元洪指示北伐方略電》裏他對北伐做了戰略上的佈局。此後，北伐軍所向無前，連戰皆捷，各路亦正謀分進合擊，直搗幽燕。但清廷授意袁世凱假和談，並用計攫取了辛亥革命革命的勝利果實。

從此，孫中山重整旗鼓，走上了保衛民國、改造民國的長達13年的武裝鬥爭。“十餘年間，由討袁之役（民二及民四兩次），而護法之役（民六聲討馮國璋，段祺瑞）、而討莫榮新之役（民九）、討陸榮廷之役（民十），而討陳炯明之役（民十一至十三），而討沈鴻英之役（民十二）及削平廣州商團之變（民十三）等。”⁽¹²⁾通過這些武裝鬥爭，孫中山在建立民主主義共和國的進程中開展了艱苦的探索。他的軍事思想也在這些曲折複雜的鬥爭中不斷豐富和發展。

李浴日以孫中山平定陳炯明廣州叛亂和惠州東征為例，從孫中山的膽色、決斷能力、指揮作戰才幹、戰略佈局等方面進行闡述，說明孫中山“比之中外古今的名將，毫無遜色。”第一，臨危不懼的膽色：“於民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嗾使部下葉舉圍攻總統府，欲置國父于死地……（國父）在叛軍的刀光劍影中，從容退入楚豫艦，轉登永豐艦。”進攻車歪炮臺時，“各艦艦長目擊叛軍炮火佔優勢，畏縮不敢前進，國父以身作則，令座艦駛於先頭，一致攻擊前進。”當坐艦寄碇白鵝潭時，陳炯明運動海軍嘩變，施放水雷魚雷，威脅國父，遣派飛機，盤旋於坐艦之上，又用民船鋼板小輪及敢死隊，圖襲國父座艦，“這時全體官兵均驚惶失色，國父卻屹然不動。”第二，英勇、機智決斷的能力：“二十日，至飛鵝嶺籌攻惠州，上午十一時至炮兵陣地，被逆軍發見，敵即不斷發炮向國父射擊，彈落身旁，距不尋丈，從者多為國父危，而國父但論以無恐，並謂敵炮射程已止於此，縱密發，必不及。此種大無畏精神，與料敵之準確，軍事專家歎為罕見。”⁽¹³⁾當肇和、海琛、海圻三大艦為陳炯明運動，駛離黃埔時，叛軍以為國父所停止在黃埔各小艦，由於海心岡水深只有六尺，不能通過。“他為應付這個突變，即派員往測該處河水的深度，一聽得水深達十五尺的報告，私心大喜，立即督率各艦從黃埔上游，經海心岡駛出……這一個斷然的處置，使全體海軍將士，為之心折，就是叛軍方面，也深驚其神算。”第三，統攬全局的戰略佈局：“競存不日動，各宜先後繼起。艦隊若遇被令分防，宜立即集中江門，與附近各營同時起事。並令少部隊與數小艦進攻三水，握而守之，以斷其交通之路。以大隊

水陸並進，取香山、順德握而守之，以容奇為艦隊根據，以大良為部隊大營，以甘竹、勒樓、黃連、紫坭菜、蕉門中一帶之水為防線，水陸軍握而守之，為持久計。此防佈置妥當，即分兵進取虎門東莞石龍一帶為右翼，以絕彼東江之交通。然後分東西路水陸夾攻：西路取道官窯石門，水路以攻石井，東路取道廣九鐵路，進攻長州牛山各炮臺。得手進攻河南花地，與西路聯絡，而包圍佛山陳村敵軍，盡繳其械。如此省城可不攻而下矣，此作戰方略之大要也。務望與艦隊同志謹識而執行之！”⁽¹⁴⁾

李浴日通過以上戰例概括孫中山的謀略思想和指揮藝術，以無可辯駁的史實確認孫中山為一個偉大的軍事家的歷史地位。正如毛澤東所說：“從孫中山組織革命的小團體起，他就進行了幾次反清武裝起義。到了同盟會時期，更充滿了武裝起義的事蹟，直至辛亥革命，武裝推翻了清朝。中華革命黨時期，進行了武裝的反袁運動。後來的海軍南下，桂林北伐和創設黃埔，都是孫中山的戰爭事業。”⁽¹⁵⁾

二、關於三民主義戰爭觀

三民主義戰爭觀是孫中山關於戰爭問題的總的看法。包括他對戰爭的起源、本質、目的、歷史作用、戰爭諸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繫、對待戰爭的態度、消滅戰爭的途徑等問題的基本觀點。是衡量孫中山三民主義戰爭正義性質的重要標誌。李浴日在《中山戰爭論》裏對這一重要問題給以初步概括和總結。

（一）戰爭的定義

李浴日認為，孫中山對“戰爭”做了如下的定義：“國父對於戰爭這個術語雖然沒有下過一個完整的定義，但在《民權主義》裏卻說過：‘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¹⁶⁾“國父亦認（為）戰爭屬於政治的形態，他說：‘政治的海、陸軍力’，跟著又說：‘應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¹⁷⁾這個界定基本上揭示出戰爭的內涵，表明戰爭是指“為了一定的政治、經濟目的而進行的武裝鬥爭”，是政治通過暴力的繼續。然而，孫中山並未看到階級鬥爭是戰爭發生的另一種形式：“國父認為階級戰爭，是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在今日的中國則不能發動此種戰爭。他說：‘階級戰爭，即工人與資本家之戰爭也。此種之戰爭，現已發動於各工業國家者，極形劇烈……中國因工業進步之遲緩，故就形式上觀之，尚未流入階級戰爭中。吾國之所謂工人者，通稱為苦力，而其生活只以手為飯碗，不論何資本家，若能成一小工店予他等以工作者，將必歡迎

之。況資本家在中國寥若晨星，亦僅見於通商口岸耳。’ ”⁽¹⁸⁾ 它反映了孫中山對戰爭認識的歷史局限性。

（二）戰爭的起源

李浴日認為，國父對於戰爭發生的見解，不是看做偶然的現象，也不是看做經常的現象。他認為有國家即有戰爭，戰爭是國家間不可避免的現象：“論國家之起源，大概以侵略人之目的，或以避免人侵略之目的而為結合，其侵略人固為戰爭，即欲避人侵略亦不能避去戰爭。”⁽¹⁹⁾ 即是說戰爭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又認為帝國主義“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別國的主義……歐洲各民族都染上了這種主義、所以常常發生戰爭。”⁽²⁰⁾ 表明帝國主義就是侵略，就是戰爭。還認為“在革命過程中，戰爭亦為不可避免的現象，誠以革命是最艱巨的事業，或為從事于統治者的推翻，或為從事于侵略者的打倒，唯有訴諸流血的戰爭，決不是採取溫和的手段所可奏效。故國父當革命之始，即揭櫫‘趨除韃虜’的綱領。又確定‘軍政時期’為革命建設步驟的第一個時期。換言之，就是戰爭時期。”⁽²¹⁾ 即是說三民主義革命必須走武裝鬥爭道路，用戰爭來解決問題。

李浴日關於孫中山的戰爭發生的三方面的論述，表明孫中山已經能正確看待戰爭的起源問題。但在《民權主義第一講》裏他把戰爭劃分為4個時期，其中“人同獸爭”、“人同天爭”

（見李浴日《縱橫戰史》）當做戰爭發生的前2個時期，對戰爭的起源做了比較含糊的解釋。而他關於三民主義革命戰爭的論述，卻反映了孫中山暴力革命思想的形成和飛躍。

（三）戰爭的目的

李浴日認為，三民主義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制止戰爭，消滅戰爭，求得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和平。他從民族主義出發，把民族戰爭區分為“侵略戰爭”和“革命戰爭”：“就是國父不是克氏為戰爭而戰爭的論者，乃是為革命而戰爭的論者，他一面反對‘野蠻’與‘弱肉強食’的侵略戰爭，另一面卻主張‘以戰止戰’，‘為人類作幹城，為進化除障礙’的革命戰爭。亦即為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戰爭，可見他的戰爭思想比克氏來得正確和進步。”⁽²²⁾，表明三民主義戰爭是民族自衛戰爭，是挽救民族危亡和抗擊外侵必須採取的手段，是正義的戰爭。而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是野蠻戰爭，是非正義的戰爭。它反映了孫中山三民主義戰爭觀在新的國內、國際條件下的豐富和發展。“至於根據國父最高的理想，戰爭並不是永遠不會消滅的，卻有待於大同世界的實現……這便是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亦即三民主義最高理想的實現。”⁽²³⁾ 這就是說，戰爭將隨著

“大同世界”的實現而消亡。從李浴日的概括可以看出，“以戰止戰”的戰爭目的，反映了孫中山一生求和平、求解放、謀統一的戰爭思想。這是同時代最為革命的進步思想。

（四）三民主義戰爭的本質

李浴日認為，“大凡戰爭思想是政治思想的反映，國父的三民主義是我們的政治思想。自然我們的戰爭思想也是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即為實行三民主義，造成民有、民治、民享的為國家而戰的戰爭思想。”又說：“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的本質，是為求生存的，求和平的，又是反極權的，反侵略的，這是與民主主義的戰爭思想相協調，相一致，抑且更為進步和完美。”⁽²⁴⁾。根據李浴日的闡述，包含著如下三大內容：

1、為民族生存而戰。李浴日認為，“這可以說是國父戰爭思想的核心。”它有三層意思。第一，民族壓迫必須通過民族戰爭來解決。李浴日認為，孫中山已經意識到改良主義不能解決民族矛盾，必須採用戰爭手段：“滿清政府，窮兇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同盟會宣言》）“吾人鑒於天賦人權之萬難放棄，神聖義務之不容不盡，是用訴之武力，冀脫吾人及世世子孫于萬重羈軛。”“所以國父當進行推翻專制君主的滿清之時，便倡率起義，採取戰爭手段。”表明推翻滿清封建專制必須依靠暴力革命，才能換取民族解放、國內和平。第二，抵禦帝國主義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李浴日認為，這是孫中山民族主義戰爭的一個重要內容。孫中山逐步認識到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它們以侵略和掠奪財富為目的：“國際戰爭者無他，純然一簡直有組織之大強盜行為耳。故對此種強盜行為，凡有心人，莫不深疾痛恨之。”（《實業計畫結論》）“歐洲數年大戰的結果，還是不能消滅帝國主義，因為當時的戰爭，是一國的帝國主義和別國的帝國主義相衝突的戰爭，不是野蠻和文明的戰爭，不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仍是一個帝國主義打倒別個帝國主義，留下來的還是帝國主義。”⁽²⁵⁾這是孫中山暴力革命思想的一個重要轉化。抵制帝國主義侵略，孫中山提出了一系列主張。如“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積極的，這種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鬥。二是消極的，這種方法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極的抵抗，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免致滅亡。”⁽²⁶⁾這對提振中華民族意識、抵制西方列強的侵略起到了號召的作用。第三，必須扶助世界弱小民族、國家的生存。他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時說：“要請歐洲人之在亞洲者，俱以和平方法，退還亞洲人之權利，如果不能達到目的，便當訴諸武力。”表明孫中山始終把爭取民族獨立和捍衛世界和平緊緊地連接在一起。

李浴日概括說：“依此可見，國父的戰爭思想是以民族、國家的生存為核心昭然若揭。他發動推翻滿清，是為求中華民族的生存，他主張抵抗帝俄，也是為求中華民族的生存，他屢次興師討賊，也是為求中華民族的生存。”表明孫中山戰爭思想的民主革命性和時代進步性。

2、為民權而戰。內容包括：第一，建立和實現共和國的民主政治，要經過“軍法”、“約法”、“憲法”三個時期，只有依靠革命暴力，才能確保這三個時期方案的實現。孫中山認為，“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軍閥惟知以武力據地盤，以欺詐保權利。”所以，民國建立後，他先後實行討袁、護法、討莫、討陸、討陳、討沈及北伐曹吳的鬥爭。“軍事的奮鬥，推翻不良的政府，趕走一般軍閥官僚。”表明孫中山已經認識到只有依靠武力才能捍衛民主共和。第二，為民權而戰就是為正義而戰：“四年以來，愛國之士，討伐軍閥及賣國賊，無非為護法主義及國家生存計，此不能名為南北之爭，實共和主義與軍閥主義宣戰，愛國者與禍國者宣戰而已。”⁽²⁷⁾他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說：“事實上，不能禁軍閥中之一派不對於他派而施以攻擊，且凡屬軍閥莫不擁有雇傭軍隊，推其結果，不能不出於戰爭，出於搶奪，蓋搶奪於鄰省，較之搶奪於本省為尤易也。”這就是說，三民主義革命是正義鬥爭，只有趕走封建軍閥，人民才真正掌握政權。

3、為民生而戰。有三層意思。第一，為生存而戰。李浴日認為，“這可以說是國父戰爭思想的核心。”因為“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²⁸⁾又認為，“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國父說得更明白：‘人類如能夠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表明當人類的生存遭到威脅，就要通過戰爭途徑進行防禦和自衛。第二，要把戰爭與解決民生問題結合起來。李浴日認為：“國父早見及此，于《上李鴻章書》中，就提出‘地盡其利’的‘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為‘富強大經，治國大本’。於《民主主義》裏又強調：‘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吃飯問題。’又說：‘吃飯問題就是頂重要的民生問題，如果吃飯問題不能解決，民生主義便沒法解決。’表明戰爭影響民生，民生也可以影響戰爭。第三，解決民生的經濟問題不需要用戰爭手段。也就是說獲得政權之後平均地權，使耕者有其田，節制資本不需要通過戰爭途徑去解決。但要把進行民族、民權革命戰爭作為解決民生的前提條件。李浴日對這一問題闡釋較為簡略。

基於以上的論述，李浴日認為，“國父的戰爭思想是革命的，是救國救世的戰爭思想。換言之，是以‘仁’為中心並以‘世界大同’為最高理想的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這“便是國父戰爭思想的本質，亦即國父的戰爭觀。”從中可知，李浴日概括的孫中山三民主義戰爭觀相當充分和完整，說明三民主義戰爭觀是以民主革命為基礎的，是以民族革命為前提的。目的是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民主、自由、富強。

（五）關於戰爭與政治、經濟、宣傳諸因素的關係

1、戰爭與政治。李浴日認為，孫中山對戰爭與政治的關係的認識是：戰爭是政治的手段，政治能反映出戰爭的本質。克勞塞維茨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國父是受著克氏學說的影響的，但克氏是為戰爭而戰爭，卻不問政治目的的好壞，國父卻是為革命而戰爭，有著偉大的政治理想，這是國父比克氏進步得多了。”⁽²⁹⁾李浴日還認為，孫中山對戰爭與政治關係的理解，反映在他對政治跟戰爭的作用的理解上，尤其是作為政治的兩大形態——內政和外交對戰爭的影響方面。“我且把國父關於戰爭與政治的言論亦即戰時政治的言論，分為內政與外交兩方面來研究。”（1）內政關係戰爭勝敗的所在。因此，戰爭要求於內政：首先要舉國團結一致。“中國現在時勢，在危險時代，如各自為謀，不以國家為前提，無論外人虎視眈眈，瓜分之禍，危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謀，而離心離德，亦難有成。是中國欲建鞏固之國家，非萬眾一心，群策群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覬覦。”⁽³⁰⁾其次，內政要服務戰爭，做到“足食”、“足兵”，建立“萬能政府”、實行集權等。離開了這兩點，非導致戰爭失敗不可。（2）外交。李浴日說，孫中山認為外交的作用也相當大。戰前，外交可代替軍事；戰爭一經爆發，外交就要協助軍事；戰後，外交又是促進和平的手段。“用政治力亡人國家，本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³¹⁾“凡國家之國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達其目的。外交手段既盡，始可及於戰爭，戰爭既畢，仍當復於外交之序。故國與國遇，用外交手段與用戰爭手段，均為行其政策所不可闕者。”因此，他提出了搞好外交的有關主張。如“聯絡素日親厚與國，亦即‘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和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主義”的兩個基本方針，還提出了要明瞭情況、爭取自主、把握利害幾項外交政策。如“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大凡立國必須與利害相關之國，攜手進行，方能進步，利害不相關之國，縱彼欲與我相親，但是不可以與之親近者……今日謀鞏固中華民國，必須注重外交。”等等⁽³²⁾這些主張，建立在相互平等、和平共處、自主、互利的基礎上，它與清政府的屈辱外交及帝國主義的侵略外交有本質的區別。為現當代制定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李浴日關於孫中山的戰爭和政治及其各要素的關係的論述，說明軍事從屬於政治，政治是戰爭勝利的首要因素，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依存。

2、戰爭與經濟。李浴日認為，孫中山深刻體會到經濟是決定戰爭勝敗的重要因素，戰爭離不開經濟。“近代戰爭是金錢的大需要者，也是金錢的大量消耗者。”即戰爭不僅是軍事、政治的較量，同時也是經濟的較量。而一國經濟主要體現在財政、工業、糧食、交通等方面。(1) 財政。戰爭需要財政的支援和保障，財政制約著戰爭發生和進行：“倘財政之困難能解決，則軍事敢說必有把握。”孫中山在一系列的軍事鬥爭實踐中，採取了諸如發行、增稅、借債及募捐等辦法和措施，解決戰時財政問題，形成了他的財政思想。(2) 工業。它在現代戰爭上的重要性並不亞於財政。戰爭可以促進工業的發展，工業發展的快慢對戰爭產生影響。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實業計畫》裏就如何發展工業提出了許多主張。這些主張包括引進外國技術和人才，發展煤、鐵、石油等礦業，處理好平時工業與戰時工業的關係等方面。如“吾國既具有天然之富源，無量之人工，極大之市場，倘能借此機會，而利用歐美戰後之機器與人才，則數年之後，吾國實業之發達，亦能並駕歐美矣。”⁽³³⁾這些主張反映了孫中山富民強國的民生思想。(3) 糧食。糧食是戰爭的生命，決定戰爭的勝敗。孫中山在《大同主義》裏十分明瞭地闡述了糧食與戰爭的關係，他以第一次歐戰的德國為例，說明吃飯問題是關係國家存亡的：德國的糧食，在平時已經是不夠，歐戰時，許多農民都去當兵士，生產減少，糧食更缺，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便以失敗結束。可見全國的吃飯問題是很重要的⁽³⁴⁾他強調，實現中國糧食自給，首先從增加生產著手。如採取7個增加生產的方法（機器、肥料、換種、除害、製造、運送、防災）。其次做好糧食消費的管理，如設置“糧食管理局”、穩定糧價等。再次，要在法律上做出種種規定來保護農民。如給他們鼓勵和保障，平均地權，使耕者有其田等。(4) 交通。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軍事行動的生命線。現代交通，分為陸、海（水）、空三大系統。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後，“目睹中國交通的落後，又認為交通上最緊要的是鐵路。”十分重視交通建設，曾專任鐵路總辦職務。如何發展交通，孫中山在《實業計劃》等著作裏，提出了具體的內容。

戰爭與經濟的關係，是孫中山民生思想的重要內容。李浴日對孫中山關於這一問題的闡釋，說明孫中山已經看到了戰爭對經濟的巨大依賴作用，同時看到了戰爭對經濟的間接促進作用。解決經濟問題，就解決了戰爭中的重大問題，也就解決了民生中的社會重大問題。

3、戰爭與宣傳。孫中山深深體會到宣傳在暴力革命中重要性。在《言語文字的奮鬥講詞》裏指出：“向民眾宣傳，就是同向敵人的猛然進攻一樣。”說明它的效力相當大。又說：“革命成功極好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用一成。”同時，認識到宣傳在戰爭中對敵我雙方

發揮的巨大作用。如對敵宣傳能夠瓦解敵人，使敵方嘩變，“變反動的兵力為革命的兵力”；對己宣傳能夠激發愛黨、愛國熱情，在對敵鬥爭中團結一致等。武昌起義之所以能夠成功，就是因為“那些清兵有自動力的根本原因，全是由於我們宣傳的效果。”因此，他提出了做好宣傳戰的種種方法和主張。如做好宣傳作戰計劃、注意宣傳方法、培養宣傳人才等。在《軍隊戰勝與黨員奮鬥》中強調：“諸君去年到今，筆墨上用力不少，然或不免于浪費，蓋作戰須有計劃，攻擊必有目標。”“我黨均須每日學習宣傳方法，時時訓練，訓練純熟，然後才能戰勝一切。”這是說宣傳戰要先于武力戰而開始，武力戰一開始更要作適切的配合。

李浴日對孫中山關於影響戰爭各因素及採取有關措施的分析 and 論述，說明戰爭不是孤立的產物，它是一種錯綜複雜的社會現象。孫中山重視戰爭關係，從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入手，闡述他對戰爭與政治、戰爭與經濟、戰爭與宣傳問題的看法，形成了新的戰爭觀，具有時代精神。

三、國防建設思想

“國防建設即是戰爭準備”，包括精神國防和物質國防兩部分，“或分為政治國防、經濟國防、文化國防及軍事國防。”李浴日認為，國防建設是孫中山軍事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之一。根據李浴日的考證，“國父的國防言論，可以遠溯《上李鴻章書》的‘人盡其材，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這也可以說是他最初關於國防的主張。”此後於1912年在《廣州軍界歡迎會致詞》、1913年《覆陳其美先生論建設國防武備書》、1924年演講三民主義中等處對國防建設提出闡述。所以，國父因飽受第一次歐戰的教訓，又目擊國防廢弛所導致的危機，更感到過去“海防論”、“洋務論”、“時務論”及“維新論”的錯誤與失敗，認識到“沒有國防，便沒有國家。”多次強調國防建設的重要性，決意為國防建設開闢一條新生之路。1921年7月8日給廖仲愷的信裏，又列出《十年國防計劃》綱目，計有62條，內容相當豐富。李浴日據此歸納為如下四方面：

（一）國防政治建設。主要包括：國防與國（主）權，國防與憲法，國防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關係，國防員警之訓練，都市與鄉村之國防計劃，國防與人口問題，移民東三省、新疆、西藏、內外蒙古各邊省計劃，保護海外各地華僑、外交之政策和戰時外交之政策等（參見《十年國防計劃》綱目）。

(二) 國防經濟建設。國防經濟表現為三種形態：第一、平時經濟，作戰爭的準備，其主要目的，仍在滿足一般國民經濟的需要；第二、過渡時期經濟，即在戰爭危機迫切的時候，實行各種準備戰時經濟的手段，如經濟動員；第三、戰時經濟。即經濟戰爭，主要在滿足國防武力，國民經濟的需要，及對敵實施經濟戰。國防經濟建設計劃，具體包括國防與實業計劃之關係、發展國防工業計劃、發展國防農業計劃、發展國防礦業計劃、發展國防商業計劃、發展國防交通計劃、發展國防交通計劃、財政之整理等（同上）。

(三) 國防文化建設：充實文化的力量，首在實現學校教育的國防化，但亦包括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的國防化。旨在把每一個國民養成“國防人”，以參加國防工作及全民戰爭。其主要內容有：訓練國防基本人才三千萬計劃，訓練國防物質工程技術人才一千萬計劃、指導國民研究軍事學問之研究、獎勵國民關於國防物質科學發明之方略等等。

(四) 國防軍事建設：軍事建設是國防建設的重中之重。“軍事在國防上為重要的一環。上述政治、經濟、文化諸部門均要與軍事配合而並進。”軍事建設的內容主要有：一是軍事教育，即包括軍事教育之改革與訓練計劃，軍人精神教育與物質教育之比較，訓練不敗之海陸空軍計劃，遣派青年軍校學生留學歐美各國、學習於各軍事專門學校及國防科學、物質工程專門學校之意見書，聘請列強軍事專門人員來華教練我海、陸、空軍事學生及教練國防物質技術工程之意見書），二是軍制之改革，即實施全國精兵政策，組織海、陸、空軍隊之標準、軍醫之整理及改良軍人衛生之建設計劃、軍用禽獸之訓練、軍器之改良計劃向列強定制各項海陸空新式兵器，如潛水艇、航空機、坦克炮車、軍用飛艇、汽球等，為充實我國之精銳兵器，與仿製兵器之需。擴張漢陽兵工廠，如德國克虜伯炮廠之計劃。我國之海軍建艦計劃、航空建機計劃、陸軍之各種新式槍炮戰車及科學兵器機械兵器建造計劃。購買各國軍事書籍、軍用品、軍用科學儀器、軍用交通器具、軍用大小儀器等，以為整理之需。新兵器之標準、各地軍港、要塞、炮臺、航空港之新建設計劃、發展海軍建設計劃、發展陸軍建設計劃。三是作戰計劃，即舉行全國總動員之大演習計劃與全國海陸空軍隊國防攻守戰術之大操演等。

李浴日認為，孫中山的《十年國防計劃》綱目體現了他的國防建設思想。表明他始終把國家安全放在首位，把維護國家利益、抵抗侵略作為國防政策的立足點，這對樹立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具有重大的意義。時至今日，它對我們建設強大、新型的國防，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四、建軍思想

（一）建軍要圖

李浴日認為，孫中山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就建軍問題有經驗也有教訓。所以，自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常以建軍為宣導。在《〈共和須以兵力為保障〉講詞》說：“中國向以積弱稱，由於兵力不強……現在共和粗建，須以兵力為保障。”“我中國未革命以前，列強環伺，欺凌侵並，無非以我國武力不足。今日民國正革命草創，欲中國成為鞏固之民國，非有精強陸軍不可。故民國前途依賴我軍人之力正多。今日要務在乎擴張軍備，以完成鞏固之國，然後可與世界列強並駕齊驅。”⁽³⁵⁾表明孫中山認識到建軍是每一民族、國家的大事，從而使他從改造會黨向建立革命軍隊的轉變。李浴日認為，孫中山建軍的意見和主張，主要包括如下內容：

1、整理軍政。整理軍政是孫中山建設強大國防的重大舉措之一。他在《國民黨政見宣言》中說：“今日處於武裝和平世界，對外方面，軍備亟須擴張，然擴張軍備，當自整理軍備始。蓋擴張軍備之舉，須待諸三四年後，而今日入手方法，則在整理軍政，軍政整理有序，而後始有擴張可言也。”⁽³⁶⁾整理軍政的方法有五種：(1) 劃分軍區。除行政區域外，全國再劃分數個大軍區，軍區獨立處理軍事，不僅可以集中精力于軍備建設，也可實現軍政分開，避免權力過分集中。(2) 統一軍制。今各省軍隊編制不一，紛歧錯亂，非軍事所宜。應使全國軍隊，按一定編制，俾軍事歸於統一。(3) 裁汰冗兵。將操練不勤、老弱無用者盡行裁撤，留得強壯者訓練純熟，使之成軍；實行“工兵”政策，對軍隊下級軍官和士兵進行農業及職業教育，使士兵退出現役時有就業機會，不致成為散兵游勇；將募兵制改為徵兵制，把國民當兵“定為義務，兩年一易”，使每一國民不僅能享受國家權利，也能為國家盡義務。(4) 興軍事教育。在全國學校，特別是大、中學中普及軍事知識教育，以養成一般將校人才，利於戰時擴充兵員。而創辦黃埔軍校是一個重大的舉措。1924年1月，黃埔軍校正式開學。黃埔軍校的創辦，為革命軍培養了大量軍事骨幹力量。(5) 擴充兵工廠：首先要增加武器生產，供給軍隊以充足的武器，同時向列強定購各種海、陸、空新式兵器，如潛水艇、飛機、坦克等，“以為充實我國之精銳兵器與仿製兵器之需”。整理軍政，實際包括對舊軍隊改造等內容。

2、加強練兵。李浴日認為，孫中山十分重視練兵工作，認為“練兵一事，為今日根本之圖。”練兵的目的，是把他們練成既有獨立作戰能力，又要具有不怕死的精神。加強練兵，必須選好教練。精兵全靠教練，教練得不好，系乎戰爭的勝敗至巨。練兵的內容，一是精神的訓練。主要在養成其忠、勇合群的性格，以一當十的鬥志，不成功即成仁的精神，按照《軍人精神教

育》所講的內容，自然非短期所能完成，須假以相當長久期間。二是改革編制。孫中山在《致蔣中正函》中提出了具體的主張。可見，練兵是建軍不可缺少的一環。

3、改善官兵生活。孫中山主張合理解決官兵的生活，以此鼓舞士氣，安定軍心：“兵士于革命勝利之後，國家應給以適當之土地，使復歸於善良之農民。”“將現時募兵制度漸改為徵兵制度，同時注意改善下級軍官及兵士之經濟狀況，並增進其法律地位，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育，及職業教育，嚴定軍官之資格，改革任免軍官之方法。”⁽³⁷⁾李浴日認為，“這個生活問題，是包括服役與除役、退役的生活問題。政綱中所說的‘注意……經濟狀況’，系指服役時的生活問題，如薪餉如何提高，衣食如何改善等。提案中所說的‘給以適當之土地’是指除役退役後的生活問題。至於‘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育，及職業教育’，這是為增進其改善生活的技能的。”從中可以看出，孫中山對於官兵的生活問題非常重視。他把改善官兵生活作為建軍的一項內容。

4、實行兵工政策。兵工政策就是“化兵為工”政策，即先行裁兵、安插被裁之兵。1923年初，孫中山陸續發表《和平統一宣言》、《裁兵築路》、《欲救廣東宜從裁兵禁賭及政良吏治著手》、《和平統一化兵為工》等講詞，以及《裁兵為統一和平之根本條件》談話，對兵工政策作積極而廣泛的號召。此外，關於空軍、海軍及裝甲部隊，他也有不少主張。表明孫中山的兵工政策是精兵政策，目的是強化革命軍的戰鬥力。

5、加強軍人精神教育。李浴日認為：孫中山十分重視軍人精神教育，認為軍人精神教育關係到建軍的成敗，加強軍人精神教育是建設強有力革命軍的重要保證。他在《精神教育之要旨》一節裏說：“欲身任非常之事業，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為何？即軍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然革命精神，何自來耶？是在精神教育。”⁽³⁸⁾通過教育，使每一個軍人深明革命大義和軍人自己的神聖責任，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樂於為國犧牲。軍人精神教育有智、仁、勇、決心等內容，同時也包含物質的內含。不過核心是革命的三民主義教育。在《十年國防計畫》綱目中，他曾列有“軍人精神教育與物質教育之比較”一條，主張二者必須同時注意，強調現代化的軍隊必須有現代化的科學技術來充實。孫中山先生深感我國物質科學技術落後，因而常遭科學技術水準高的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他曾大聲疾呼地號召革命軍人和全國人民在這方面向西方國家急起直追。

6、建立、健全軍紀。孫中山認為，軍紀是發揮軍隊戰鬥力重要因素。他認識到舊時的軍隊像一盤散沙所帶來的危害，因而他特別強調：“倘軍人與官吏藉口于共和與自由，破壞紀律，則國家機關，萬不能統一。機關不能統一，則執事者無專責，勢如一盤散沙，又何能為國民辦事！是故所貴乎機關者，全在服從紀律”⁽³⁹⁾。在同盟會時代和倒袁時代，孫中山先生都制定有極

嚴的軍紀。如同盟會時代，他頒佈的軍律就有 22 條。如“降敵被獲者殺”、“私通軍情於敵者殺”、“強姦婦女者殺”、“焚殺良民者殺”、“私入良民家宅者罰”等，還有對盜竊者、賭博者、吃鴉片者進行嚴罰等等，這些都是相當嚴峻的。通過建立、健全軍紀，以確保自覺遵守紀律的重要性。

孫中山的建軍思想和方略並不是一次形成的，它是經過長期的革命實踐摸索出來的。它對辛亥革命、討袁戰爭、北伐戰爭等都有較強的指導性，它奠定了中國近現代軍事建軍的基礎。

五、戰略、戰術思想

李浴日說，戰略與戰術的關係，正如母子一樣，戰術依存於戰略，又隨戰略所指示的方針而行動，戰術的行動可以影響戰略的成敗，而正確的战略卻常能給予戰術致勝的基礎。他認為，孫中山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中非常重視對戰略、戰術的研究，他不僅運用了許多戰略、戰術，而且創造了不少戰略、戰術。李浴日歸納為：“在對內的革命戰爭中所採取的戰略是攻勢，即‘戰略攻勢’，在對外的革命戰爭上所主張的是守勢，即‘戰略守勢’，至於戰術則以採取攻擊為主。”

(40)

（一）戰略方面

1、戰略攻勢。有如下幾種：(1) 奇襲式進攻戰略：這種戰略出其不意，靈活變動，神出鬼沒。李浴日認為，“國父在對內的革命戰爭中，所採取的戰法，像民元以前的進攻滿清，是一種奇襲式的攻擊，亦可稱為遊擊戰。”它是孫中山暴力革命早期較常採用的戰略。如欽廉之役，“能一戰而去清兵四分之一，可稱奇捷。”又如鎮南關之役，“孫中山先生于一九零七年命黃明堂適時攻佔鎮南關，又適時退出，這是一個典型的遊擊戰。”(2) 義旗起呼，義動天地戰略。也叫一地起義，數地響應戰略。1915 年發表《討袁宣言》說：“一旦義旗起呼，義動天地，當以秦隴一軍，出關北指，川楚一軍，規劃中原。閩粵旌旗橫海，合齊魯以搗京左。三軍既興，我將與諸君子，扼揚子江口，定蘇浙以樹東南之威。犁庭掃穴，共戮國賊，期可指日待焉。”(3) 以少勝多進攻戰略：它是指數目較少的一方，進攻並擊敗數目多的敵人。其優勢“或指揮人力、物力較少者之智力，或為將士用命。李浴日認為，“民元的興師北伐，是採取戰略攻勢，民十一、十三的兩次北伐以及歷次的討賊軍事，也是採取戰略攻勢即以精神力比敵處於優勢的革命軍（然人數武器比敵處於劣勢），作連續的進攻，求敵而殲滅之。”⁽⁴¹⁾ 1915 年討袁、1917 年護法也是採取這個戰略：“凡我各省軍民代表同心戮力……運籌宜決而密，用兵貴神而速，自能垂手燕雲，復仇報國，直抵黃龍府，與同胞痛飲策勳。”⁽⁴²⁾ (4) “分進合擊”、速戰速決進攻戰略：就是命令

軍隊從不同方位快速前進，協同圍擊同一目標。1924年東征陳炯明就是採取這種戰略：“望兄鼓勵各人速出，一由東江擊破陳逆而出福建，一出江西，則川湘各軍必爭先而出武漢，而中原可為我有。否則不論奉直誰勝，西南必亡。際此之時，能進則存，不進則亡，必然之理也。”⁽⁴³⁾ 1924年北伐也是採取這種戰略。他在《致蔣中正的信》說：“江西得救，則湖南不成問題，然後再會滇唐、川熊、黔袁，會師武漢，以窺中原，曹吳不足平也。”李浴日說：“于此可見，國父是採取拿破崙‘分進合擊’的戰略原則。”(5) 先發制人戰略。即要進攻，其行動必先發制人，爭取戰爭最初勝利，然後發展為整個勝利。李浴日認為這是我國古代兵法常用戰略：“中山先生……所定計劃，厥有兩端：……一曰聯日……二曰速戰：中山先生以為袁氏手握大權，發號施令，調兵遣將，行動極稱自由，我惟有出其不易，攻其無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且謂宋案證據已確鑿，人心激昂，民氣憤張，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機一縱即逝，後悔終嗟無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⁴⁴⁾ 可見，孫中山在不同時期所採取的戰略是不同的。

2、戰略守勢。即戰略防禦。李浴日認為，“關於對外抗戰的戰略，國父基於當時的情勢是主張取守勢的，亦即持久戰略，消耗戰略。因為敵人來侵，施行攻勢作戰，利在包圍殲滅，速戰速決，而我因軍力比敵劣勢，自然要施行守勢作戰以制之。但國父所謂‘守’，決不是絕對的‘守’，永遠的‘守’，是以反攻為最後目標的‘守’。”

守勢戰略亦有如下幾種：(1)先守後攻戰略。民初沙俄侵略我外蒙古，孫中山主張應先採取守勢戰略，即所謂謀不敗之戰略，以抗強鄰而保領土，第5年練兵800萬——1000萬，然後轉為攻勢，直抵莫斯科、聖彼德堡。在《錢幣革命通電》中它提出這個主張。(2)集中兵力殲滅敵人戰略。即集中優勢兵力迎擊來犯敵人的進攻，最後消滅敵人。“此後戰略宜大變更，集中全力速趨省城為上策，集中全力以撲滅麻子為中策，縮短戰線，以保勢力，而待援軍亦為一策。惟不忍舍去土地，與敵相持，分薄兵力則為下策。望兄速酌施行！”⁽⁴⁵⁾ “競存不日動，各宜先後繼起。艦隊若遇被令分防，宜立即集中江門，與附近各營同時起事……此防佈置妥當，即分兵進取虎門東莞石龍一帶為右翼，以絕彼東江之交通。然後分東西路水陸夾攻。”（見《再致李綺庵指示作戰方略電》）可見，孫中山在不同時期所採取的守勢戰略也是不同的。

李浴日認為，孫中山在革命實踐中對攻勢與守勢戰略，並不把兩者對立起來。雖說“較強的一方恒採取攻勢，較弱的一方恒採取守勢”，但在某種情形之下，攻勢可轉為守勢，守勢也可轉為攻勢。所以攻勢固可以取得勝利，守勢也可以取得勝利。說明孫中山對攻、守戰略已經有了辯證的認識。

（二）戰術方面

戰術，是進行戰鬥的原則和方法。它是戰爭中非常重要的問題。李浴日認為，孫中山對戰術的起源和演變有了正確的認識。“第一，關於戰術的發生。國父認為它是發生於戰鬥的事實。”即是說，戰術是戰爭的產物。“第二，關於戰術的革命。拿破崙說過：‘沒有十年不變的戰術’。克勞塞維慈也說過：‘沒有一成不變的戰法’……自然國父對於戰術的認識，不是永久不變的論者，且以受到拿翁、克氏理論的影響。”它經歷了“點的戰術”、“線的戰術”、“平面戰術”、“立體戰術”的演變過程。

李浴日還認為，孫中山重視戰爭戰術的實踐。“國父認為我國在現代戰爭中，應先講戰術。他說：‘自海禁既開之後，與英戰，與法戰，與日戰，與聯軍戰，未有不敗者，非無槍炮，不諳戰術故也。苟諳戰術，則昔日安南之黑旗，法國患之，南非洲杜國之農民，英國患之。’但他卻反對囫圇吞棗、依樣畫葫蘆地抄襲外國的戰術。”⁽⁴⁶⁾李浴日把它分為攻勢和守勢。不過，“國父的戰術是以採取攻擊為主的，並且我們根據他如下的電令亦可以看出來。”

1、攻勢戰術。(1)“以動制動”戰術。即為殲滅、戰勝敵人，對敵實行前攻、後攻、左攻、右攻、或襲擊、擾擊、誘擊、伏擊、截擊、側擊、尾擊、追擊等各種打擊。其一、電令許某：“陳天太部已出四會矣。現戰情已變，江門軍當全數出三水蘆苞，向高塘新街方面進攻，以速掃滅擊省城之敵（指陳炯明逆軍——浴日）”其二、電令胡漢民傳令永豐艦長：“現楊總司令令希閔親率滇軍由龍崗出擊淡水平山之敵，該艦長搜擊海上偷渡之敵，毋使漏網。並相機與楊總司令聯絡，協同動作。若無線電不通，著鹽運使派安北艦傳令，並助永豐擊敵。”其三、電令虎門廖湘芸司令：“我追擊軍大破殘敵于石灘之東，現已佔據福田石龍之線，殘敵向惠州潰退，虎門各部，著速出擊，以掃蕩石龍南東之殘敵為要。”⁽⁴⁷⁾(2)“奇襲”戰術。這是古代孫子主張的“以正合，以奇勝”的戰術。即以“神速”和“秘密”襲擊敵方。李浴日認為，國父在戰術上最喜用“奇兵”（有時亦包括戰略）：在《致石青陽與黃復生從速圖陝電》曾說：“用兵忌攻堅，尤貴出奇。”1923年東江之役，致電朱培德、許某等：“望顯丞抽一勁旅抄敵人後路為要。”致電劉某：“望兄急調一隊至白沙堆，一以絕敵人路，二可保我航線，聞敵人食糧輜重，皆在風門坳附近，若兄能照此行事可悉奪之，則博圍可解，我軍實亦加利莫大也。幸速圖之！”⁽⁴⁸⁾(3)

“遊勇”戰術：“即現今所謂遊擊戰術。國父于進行推翻滿清時，即用此種戰術。”此種戰術曾為安南的黑旗軍用以抗法及南非杜國的農民（波耳人）用以抗英，李浴日認為孫中山對此種戰術素有研究，覺得很有實用性，曾謂“此種戰術頗適用於中國，若以北方交戰，尤為相宜。跟著舉出此種戰術的五種技能：一曰命中，二曰隱伏，三曰耐勞，四曰走路、五曰吃粗。”⁽⁴⁹⁾孫中山在南方領導武裝起義和北伐戰爭中廣泛運用此種戰術。(4)“以寡擊眾”的非常戰術。亦稱革命戰

術，或精兵戰術。孫中山解釋道：“用我軍一千人，可以打破敵人一萬人，用我軍的一萬人，可以去打破敵軍十萬人。”甚至“用一個人打百個人，用一百個人打一萬人。”其中欽廉起義是其中典範：“自安南入欽廉起義，當時到欽廉來抵抗革命黨的清兵，有兩萬多人，黃克強帶的‘革命軍’不過兩百人，所有的武器不過兩百枝槍……照這一次戰爭說：革命軍就是用一個人去打一百人，像這樣的戰鬥，是非常的戰鬥，不可以常理論。”⁽⁵⁰⁾又如1911年3月29日廣州起義、武昌起義等，都是“以寡擊眾”的非常戰術。

以上從李浴日的歸納可以看出，孫中山作為一個偉大的軍事家，它的戰略、戰術思想非常豐富，“國父的戰略、戰術是最適用於中國革命戰爭。”他在不同的時期所採取的不同戰略、戰術對以後的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均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有些直接應用於抗日戰爭，如持久戰、遊擊戰等，這是孫中山留給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但是，他的“戰爭戰術思想與其他方面的思想比起來，也顯得比較薄弱，甚至還有片面的地方。比如孫中山雖然指明敵人是腐朽的，要敢於和敵人鬥爭……但他卻未能認識到在和敵人進行具體鬥爭中，要重視敵人，集中兵力，有效地打擊敵人。”⁽⁵¹⁾

六、關於“知難行易”的軍事哲學

（一）“知難行易”的由來

知行觀是幾千年來中國傳統哲學史觀。它源于《尚書·說命中》：“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孔傳：“言知之易，行之難。”後被概括為“知易行難”。這裏的“知”指知識、認識或道德觀念；“行”指行為、行動、實踐。孫中山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認識到中國近代革命事業不成功，是因為受到這個傳統認識論束縛。他以近代西方社會政治理論和科學技術為背景，提出了“知難行易”的哲學思想。他認為，“行”與“知”的關係是“行先知後、由行致知”。“它的特色在於把行——實踐提高到首要地位和強調真知——理性認識獲得的困難和必要。”⁽⁵²⁾強調“實踐在先，認識在後，由實踐產生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者的辯證關係；它重視科學知識和革命理論對於實踐的指導意義，具有唯物主義思想。

李浴日認為，這個哲學思想應用在“孫文兵學”中，同樣是正確的：如“發明射擊原理較實行射擊難，策定作戰計劃較執行作戰計劃難，設計架橋難於執行架橋，設計要塞難於構築要塞……推而至於發明飛機、大炮、坦克、雷達、飛彈及原子彈等亦比製造和使用為難之又難。”

⁽⁵³⁾他解釋道：“國父所謂的‘知’，決不是泛泛的知，空談的知，是真知，即科學的知。”從時間上劃分，經過三個時期：“不知而行”、“行而後知”、“知而後行”。即由古代的“不知而

行”時期，進化到中古的“行而後知”時期，再進化到近代科學發明之後的“知而後行”時期。這個劃分表明，“前者是被反映者，後者是反映者。”符合唯物史觀。然而，他又認為：對軍人來說，“亦可把最高統帥、普通軍官及士兵各階級（層）分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及不知不覺者。”這種把軍人當做三等的劃分，就帶有唯心主義色彩。

（二）“知難行易”的軍事哲學內容

1、“能知必能行”。它強調的是“知”對“行”的指導作用。孫中山在《〈國民要以人格救國〉講詞》裏說：“科學的知識，不服從迷信，對於一件事，須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過細去研究，研究屢次不錯，始認定為知識。”李浴日闡釋道：“我們軍人的智識學問，不是徒在書本上死讀死記及在課堂專心聽講，所可切於實用，須從實地觀察，實地演習，或在實戰中去理解它，去把握它，然後才不會重蹈趙括徒讀父書的覆轍。”這樣自然可以達到“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的境界。⁽⁵⁴⁾這一闡釋表明，軍事實踐是認識的源泉。軍事實踐第一，認識第二，認識必須上升到實踐上去，用實踐來檢驗。

2、“不知亦能行”。包含二層意思：一是“行先知後”。孫中山認為，人們在知（認識事物）之前，可能已經在行（實踐）。二是“行以致知”。這個“知”，李浴日解釋為包含知不完全的意思。人們在行（實踐）的過程中，可以獲取外界的知識（知），行（實踐）是由不知而致其知的途徑和手段。“比如對敵人情況不明的時候，如下最大決心，實行冒險攻擊，亦可以壓制敵人，並可以從攻擊等行動中去獲得更真確的情報，以為我進一步行動的根據。假設我們因對敵情不大明瞭，必待取得更完備的情報然後動作，固會錯過‘戰勝之本’的寶貴時間，反會給敵人以獲得關於我更真確的情報的機會，又會喪失敏捷攻擊及初步獲勝的利益。”⁽⁵⁵⁾它表明軍事實踐在先，認識在後，軍事實踐不僅是廣泛存在的客觀事實，而且是認識、進化的必要門徑。

3、“有志竟成”。李浴日認為，軍事上要完成任務，建功立業，必須立下堅定不拔的意志，發揮整個精神力量來實踐力行。否則敷衍塞責，畏難怕死，決無成功之理。“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這就是說認識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不能停滯，必須衝破禁錮，深化認識，勇於實踐，才能取得革命事業的成功。

李浴日關於孫中山“知難行易”的軍事哲學的闡述，是分析孫中山軍事哲學的精華所在，體現了李浴日對孫中山軍事哲學的深刻理解，反映了孫中山“知行觀”在暴力革命中的指導作用。

七、關於“反共、抗俄、複國”的戰爭思想

“反共、抗俄、複國”是國民黨政府撤退至臺灣後於1949年—1980年在台、澎、金、馬地區推行的政治策略及宣傳攻勢。“共”指中國共產黨，“俄”則指前蘇聯，“國”是中華民國。該政策指稱前蘇聯為“侵略者”，中國共產黨為“共匪”，對臺灣民眾加以宣傳，借此穩定人心，希望有朝一日反攻大陸，殲滅共產黨，恢復對大陸的統治。為配合這一宣傳，李浴日到臺灣後增訂出版《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並以此為例證，對孫中山軍事思想進行闡釋。與1942年出版的《中山戰爭論》比較，可以看出《中山戰爭論》是以抗日戰爭為例證，為抗戰服務，反映了李浴日的愛國、抗日思想。而《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以“反共、抗俄、複國”為例證，所作的闡釋是為蔣介石政治集團服務，這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當前，國共兩黨的關係進入了歷史發展的新時期。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是孫中山一生奮鬥的目標和遺願，是海峽兩岸每個人應肩負的歷史重任。今天，我們要運用他的戰理來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建設強大的國防。

八、李浴日的孫中山軍事理論研究的價值和貢獻

孫中山研究屬於領袖人物研究。民國時期和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大多傾向於介紹他的生平事蹟、出版其著作方面，對他的思想研究，也局限於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軍事思想研究幾近空白。李浴日對孫中山懷有崇敬之情，他基於《孫子兵法》的研究及創辦《世界兵學》的機會，促成了他對孫中山軍事理論的研究。然而，“國父戰爭理論……博大精深，闡揚匪易，尤其散見於全部遺教之中，未成體系。”⁽⁵⁶⁾因此，李浴日克服了種種困難：在韶關的山嶽中，他把寒夜冷風橫掃松濤當做“古樂般的彈奏”，把四作的野火當做“火龍的飛舞”，又借秋涼萬里長征，由韶赴渝，由渝返韶，“博訪周咨”，於1942年完成了《中山戰爭論》。當時，“對國父革命戰理作有系統的研究，尚無第二部著作”，“何況又屬創舉”。所以，該書的出版成為開拓之作，李浴日成為“孫文兵學”研究的奠基者。蔣介石對此十分重視，親自召見並當面嘉勉他（第一次召見和嘉勉為《抗戰必勝計劃》出版後）。李浴日站在民主革命的立場，第一次把孫中山的軍事理論體系化：他關於孫中山三民主義戰爭觀，軍事思想的淵源、內涵及其形成、發展，戰略戰術、軍事哲學等等做了相當系統的整理、概括和闡述，為人們認識這位元“被壓迫民族中最偉大的革命家”提供了相當豐富的歷史依據。李浴日這項有益的研究，填補了民國時期“孫文兵學”研究的空白，明確確立“孫文兵學”在近代軍事學上的理論地位。為構建孫中山軍事科學做了很大的努力和有益的嘗試，顯示出他高深的軍事理論功力。他以孫中山軍事理論為代表，用中外古今軍事戰例加以闡釋，與孫子古老的軍事理論相銜接，反映了中國古代傳統軍事學術向近現

代軍事學術成功轉型。由於“國父的戰爭理論，是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真理，所以闡揚它來建立中國今後的戰爭理論體系，實為必然的趨勢。”由於孫中山“戰爭思想，洵應特加闡揚，俾能正確指導戰爭，而永建中國今後之戰爭體系。”因此，李浴日把此項研究作為構建現代（民國時期）中國軍事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有意義的是，李浴日“卻且於闡揚戰爭思想，以救國家、民族，貢獻至偉也。”⁽⁵⁷⁾ 1943年他在再版序言裏就以此分析抗戰已到反攻階段：“國父當年誓師北伐的劍氣，啟示我們今日的抗戰是要反守為攻了。”他號召全國人民開展對日反攻。從中可知，李浴日研究孫中山戰爭理論，是希望用來指導抗日戰爭。值得一提的是，李浴日到臺灣後在其著作裏能用孫中山軍事學理客觀分析和總結國民黨在大陸的軍事失敗教訓，為蔣介石軍事集團調整軍事政策提供參考，是難能可貴的。如“我們在大陸上的失敗，實先敗于其所指揮下中共的宣傳戰。”“此次大陸的失敗，由於中共的宣傳壓倒我們的宣傳，今日我們更要加倍反省才好。須知他日反攻大陸，專靠‘軍事的奮鬥’是不夠的……還要注重‘宣傳的奮鬥’”說明李浴日是一個敢於直言的學者。李浴日對孫中山軍事理論的歷史貢獻嘉惠學林，為兩岸學術界所公認，對後來的研究起到了相當大的引導、推動作用和有很大的借鑒意義。1989年，由中國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孫中山軍事思想與實踐》一書，在大陸被同行認為“填補了國內孫中山軍事思想研究的空白”。該書概括全面，對孫中山的軍事思想的評價客觀、公允，確有特點。雖然寫作觀點、立場、方法與李浴日有所不同，但兩書卻有許多共同點。而李浴日於1942年完成的《中山戰爭論》卻比《孫中山軍事思想與實踐》早了近半個世紀（47年）。正如鄒魯評價那樣：“李君浴日夙治兵學，見解獨到，近取國父有關兵學遺教，著《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一書，將國父各種戰爭理論，分別闡述，其研究可謂勤而有獲者矣。”⁽⁵⁸⁾ “李君此書，首言國父戰爭思想，次言戰時政治、經濟、宣傳諸端，並以精神力為決勝之本，是已深得國父革命戰理之真諦。”⁽⁵⁹⁾ “李浴日先生，對兵學造詣甚深……承其述從事於《中山戰爭論》之撰著……讀之竟，則其精深獨到之處，尤深欽仰。”⁽⁶⁰⁾ 由此可見，李浴日還是一個孫中山軍事理論的捍衛者和忠實實踐者。當然，李浴日的孫中山軍事理論研究也有不足的地方，如對孫中山晚年軍事思想飛躍的研究較少涉及、對孫中山軍事理論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未能提及等等。

今年是李浴日誕辰103周年，也是辛亥革命勝利100周年，人們重溫李浴日的孫中山軍事理論研究，顯得十分有意義。我們相信，隨著孫中山軍事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李浴日這一開創性的研究及其成果，將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並將給人們更多的啟示。

謹以此文紀念李浴日先生誕辰 103 週年暨紀念辛亥革命勝利 100 週年！

注釋：

(1) (2) (3) (4) (7) (8) (10) (11) (16) (17) (19) (21) () 26) (30) (31) (32)
(34) (40) (47) (48) (49) (50) (53) (54) (55)

李浴日《中山戰爭論》（1943年12月世界兵學社再版本）第196頁，第1頁，第4頁，第2頁，第3頁，第184頁，第3頁，第5頁，第25頁，第25頁，第27頁，第27頁，第35頁，第103頁，第105頁，第111頁，第123頁，第159頁，第169頁，第170頁，第171頁，第175頁，第192頁，第194頁，第195頁。

(5) (6) (9) (12) (13) (18) (22) (23) (24) (25) (27) (29) (35) (36) (37) (38)
(39) (41) (42) (43) (44) (45) (46) (56)

李浴日《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1952年7月臺灣世界兵學社出版）第2頁，第2頁，第3頁，第6頁，第13頁，第29頁，第21頁，第22頁，第20頁，第29頁，第26頁，第48頁，第75頁，第76頁，第79頁，85頁，第94頁，第101頁，第102頁，第102頁，第102頁，第104頁，第107頁，自序。

(14) 黃季陸編《.總理全集》（1944年成都近芬書屋，下冊）180頁，

(15)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82頁。

(20) 《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21頁

(27) 《孫中山選集》第825頁

(33) 《孫中山全集·中國實業如何能發展》第5卷 第135頁

(51) 《孫中山軍事思想和實踐》（1989年4月軍事科學出版社）第251頁

(52) 張磊《孫中山論》（1986年6月廣東人民出版社）第339頁，

(57) (60) 陳南平《〈中山戰爭論〉再版序》，載1943年11月世界兵學社《兵學論叢》；

(58) (59) 鄒魯《〈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序》。

參考文獻：

- 1、《孫中山全集》；
- 2、李浴日《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1938年2月商務印書館；
- 3、李浴日《中山戰爭論》1942年7月世界兵學社；
- 4、李浴日《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1952年世界兵學社；
- 5、張磊《孫中山論》，1986年6月廣東人民出版社；
- 6、《孫中山軍事思想和實踐》1989年4月軍事科學出版社；

- 7、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1991年8月中華書局；
- 8、《李浴日紀念基金會論壇》文獻資料。

2011年6月定稿

作者介紹

李龍，1966年10月出生於雷州半島一個普通農家。大學本科畢業。長期以來，致力於區域文化的研究、創作和收藏，為雷州文化研究的民間主要學者之一。現為湛江師範學院雷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湛江海洋大學雷州文化基地研究員，雷州市第七、第八屆政協委員。電子郵箱：leizhoulilong@163.com